“范雨素现象”研讨

纯粹的底层写作何以可能？

曾 平

《我是范雨素》以简洁的文字，平静的叙述，幽默的笔调，把底层社会普通人的生存困境及对人格尊严、人生意义的不懈追求表达得淋漓尽致。整篇文章不夸张，不渲染，文笔朴素而节制，符合大众对底层叙事的想象。最令媒体和评论界感到兴奋的是，《我是范雨素》一文似乎实现了真正纯粹的底层写作，不仅范雨素育儿嫂的职业角色确保了作者底层身份的纯粹性，小说简洁克制的叙述风格似乎也确保了其底层立场的纯粹性。在评价范雨素现象时，评论界采用了“边缘写作”、“底层写作”等概念来彰显范雨素们有别于主流作家、知识阶层写作的独立立场，是未被体制、市场、主流文化污染的原生态写作。那么，《我是范雨素》果真是纯粹的底层写作吗？或者换一个说法，真的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底层写作吗？

在接受网络媒体“北京时间”的采访时，范雨素坦言，写作《我是范雨素》旨在“表达内心的情感。我开始写的名字是母亲，编辑看了以后，说你能不能加一些自己的故事？我就加上了我自己的故

事，交给编辑，然后就是他在处理素材。……《农民大哥》基本没有编辑，《我是范雨素》是编辑排过的。”范雨素的大女儿，一位年薪超过九万的第二代京城外来工，认为《农民大哥》写得很好，对这一篇引起轰动的《我是范雨素》却不置可否。同属一个阶层的范雨素女儿的看法和媒体及中产阶级的看法显然大相径庭。原因何在呢？如果大胆猜测的话，恐怕是因为《我是范雨素》经过处理后，已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正午”这一网络媒体的文学编辑的思想烙印，与大女儿所熟悉的范雨素式叙述方式有了距离。经过编辑处理后的《我是范雨素》不要说保持什么纯粹的底层立场，即便是范雨素本人的写作立场，也已受到外界力量的左右与改写。

范雨素有一个曾经一心想做文学家的大哥，一个神童小哥哥，一个堪称诗歌天才的小姐姐，这样一个家庭，在乡村是罕见的。受哥哥姐姐的影响，从童年时代开始，范雨素就几乎是贪婪地阅读找得到的一切文学作品。在《我是范雨素》一文中，她曾提到自己庞杂混乱的阅读经验：“我不光看知青文学，还看《鲁宾逊漂流记》、《神秘岛》、《孤星血泪》、《雾都孤儿》、《在人间》、《雷锋叔叔的故事》、《欧阳海之歌》、《金光

〔作者简介〕 曾 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与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1。

道》。通过看小说，我对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了如指掌。……我十二岁了，我膨胀得要炸裂了。我在屋里有空白的纸上，都写上了‘赤脚走天涯’。在十二岁那年的暑假，我不辞而别，南下去看大世界了。”事实上，就连范雨素这个名字，也来自于文学阅读的经验，是琼瑶小说《烟雨濛濛》给予乡村姑娘范菊人的馈赠。“我是最小的娃子，菊花开时生的，妈妈给我取名范菊人。十二岁那年，我看了当时最流行的言情小说《烟雨濛濛》，是琼瑶阿姨写的。便自作主张，改了名字，管自己叫范雨素。”范雨素12岁那年离家出走去浪迹天涯，也是受了她所热爱的文学作品中浪漫精神、侠客之风的蛊惑。

从范菊人变成范雨素的那一天起，范雨素的精神世界就已打上了琼瑶小说的深刻烙印，不受外界侵扰的纯粹的底层立场便已不复存在。文学带给范雨素的并非是以底层身份发声的自觉，而恰恰是希望挣脱黯淡命运并追求精神超越的执着。如果武断一些，我们甚至可以说，中产阶级及知识精英眼中的底层写作，其内在动力，恰恰来自写作者从精神层面超越所属阶层、摆脱底层标签的渴望。范雨素们，其实是他们所属群体的异类，是乡民们看不起的文章疯子。《我是范雨素》描写的大哥哥，何尝不是范雨素的另一个翻版？“大哥哥把家里的稻谷麦子换成钱，钱再换成文学刊物、经典名著。……大哥哥又读又写了好几年，没有当成文学家。身上倒添了很浓的文人气息，不修边幅，张口之乎者也。像这样的人，在村里叫做‘喝文的人’，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一样，是被人鄙视的。”来自底层的写作者，其实恰恰是与大多数底层劳动者格格不入的异类。他们的写作立场，如何能代表真正的纯粹的底层呢？《我是范雨素》中曾不止一处提到理想，提到对生命平等与人生尊严的渴求，这种精神追求显然源自长期的文学阅读带给她的超越底层身份的新立场。“曾经的我很膨胀。……我在六七岁时，学会了自己看小说。……我八岁时看懂一本竖版繁体字的《西游记》……”。借助底层立场、底层经验无法企及的

文学经典与文学传统，范雨素获得了洞悉、省察、理解自身命运的思想资源，获得了书写自身命运与情感的超越目光。

进入京城打工之后，范雨素长期生活在外来工聚集的皮村。在这里，她遇到了很多人，其中就有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的老师 and 成员们。2014年10月，有工友提议成立文学培训小组。工友之家了解到其他工友也有类似需求后，在网络上广发英雄帖招募老师，但最后只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张慧瑜应聘。范雨素走红后，4月28日，张慧瑜在网络平台发表《在皮村的日子》一文，谈及他在皮村工友之家为文学小组授课的经历：“一开始每节课我都讲一些写作技巧，比如如何写人物，如何写动作等，但效果不是很好。我也觉得写作技巧比较枯燥，写作能力还是与文学阅读、文学欣赏能力有关。因此，每次课上，我会选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与工友们分享。……我试着找一些与中学语文不同的文学作品，来激发工友们的文学兴趣。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比如路遥的《人生》和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还讲过雪莱夫人的科幻小说《弗兰根斯坦》……”显然，在皮村工友之家的文学小组中，范雨素及其工友写作者们积极主动地接受了来自知识精英的文学教化。张慧瑜在文中还分享了皮村的农民工作者所写的诗歌。在这些平时的诗歌习作中，底层意识和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的自觉意识结合在一起，情感和思想的表达都非常直白夸张，缺乏节制与含蓄。比如苑长武的《周日我在皮村等你》一诗是这么写的：“周日皮村工友之家/简陋的办公室/一台投影仪/一位老师和一群学生/上课了 屏幕上走来了/林妹妹鲁智深/祥林嫂高加林/还有安娜卡列尼娜/和一个叫葛朗台的外国人……/老师让我们结识了——/杜甫曹雪芹/鲁迅贾平凹/还有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这里的老师/是真正的老师/他们有血有肉/有灵魂有良心/他们没有把知识当商品/他们把大爱传递给我们/这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我们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这里的学生/是不一样的学生/他们有情有义/有侠骨有爱心/他们是

被称为‘农民工’的人/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这里没有老师学生之分/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4月27日《中国新闻网》发表《范雨素:不靠写文章谋生,原本只想挣点稿费》一文,称“在范雨素的写作史中,对她帮助最大的是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的张慧瑜老师和工友们。……范雨素在文学小组听了整整一年的课。”

二

范雨素在接受“北京时间”采访时说,她在网络平台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农民大哥》,是她尚未有人看过的长篇小说《久别重逢》手稿中的一个节选。《久别重逢》属于“魔幻现实题材,讲村子里的两家人自己家和舅舅一家。我写的小说中心思想就是反反复复地讲灵魂,讲帝王将相和升斗小民都是同一个灵魂。”小说表面上看像是一部穿越剧,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她所熟悉的农民,是中产阶级和知识精英眼里的底层小人物,但他们的前世却都是帝王将相。范雨素借这样一部小说,来表达她对灵魂平等的看法:不管一个人的肉身属于高高在上的权贵阶层还是属于底层社会的弱势群体,却共用着同样一个灵魂。世俗的身分因命运的安排有了高低贵贱之分,但内在的灵魂却是相同的。范雨素以她的小说,既表达了接受命运安排的豁达,又表达了追求生命尊严和精神平等的执拗。当“北京时间”的记者问她“怎么看待阶层固化”时,范雨素说:“我不觉得阶层怎么固化,大家都是焦虑的。一场大病,一场金融风暴,大家可能都会一贫如洗,只有少数几个人掌握财富。所谓中产看不起农民,我觉得他在自己哄自己。我觉得大家的财富之间并没有多大区别。”既然否认阶层固化的现象,那么,很自然地,范雨素本人对自身所属的社会阶层并没有那么固定的看法。《我是范雨素》是这样来介绍母亲的:“我的母亲,叫张先芝,生于1936年7月20日。在她14岁那年,因能说会道,善帮人解决矛盾,被民主选举为妇女主任。从1950年开始干,执政了40年,比萨达姆、卡扎菲这些政坛硬汉子的在位时间都长。”

范雨素笔下的母亲,在她所生活的乡村,绝对算是处于金字塔塔尖的人物。而范雨素自己呢?尽管触犯了乡村社会的道德底线,12岁就离家出走,浪迹天涯,回家后连继续读书的资格都丧失了,但她仍然可以靠了小哥哥的关系,小小年纪就做了一名民办老师,“我的神童小哥哥已读完大专,成了智商、情商双高的人才,当了官。母亲支使神童哥哥为十二岁的我谋了一份民办老师的工作,让我在一个偏远的小学教书,安顿了我。”如果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干下去,总有一天会转成正式教师,在当地,也算是有身分的乡村知识分子了,算不得当地的底层。

看来,即使是从现实层面,范雨素都在努力寻找阶层平等的证据,以满足自己苦苦追求人人平等和生命尊严的心理期待。“范雨素在皮村一次活动上谈农民工与艺术家,什么时候这两个词变成中性词了,这个社会才算正常了。人与人应该是平等的,艺术家并非就是高高在上的。”(见百家号“东倾”5月16日推文《一天两个红薯就够了,但一个范雨素还不够》)

三

另一位来自湖北乡村的民间诗人余秀华对范雨素的评价耐人寻味。以《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首标题另类的诗作引起媒体关注的余秀华,同样生活在底层。与范雨素不同的是,余秀华同时又是残疾人,无法靠体力劳动谋取衣食,她的内心体验比起范雨素而言,更加绝望和激烈,有着偏执的阴暗与深刻,在写作的深度与文学性上,的确超过了范雨素。作为社会底层和残疾人双重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余秀华甚至无法通过体力劳作获得普通劳动者的价值感,写作成为她追求人生尊严的惟一出口,承载了她全部的生命重量。或许,对余秀华而言,对其文字的任何轻慢与否定,就意味着对其生命价值的轻慢与否定。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有人将她与范雨素相提并论时,她的反应会如此不近人情,会那么苛刻地否定范雨素的作品,并强调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

二的存在,无法与其他任何人相提并论。其实,余秀华苦苦维护的是她写作的独特性,是害怕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来自底层的写作者统统贴上同一标签。而写作的生命恰恰来自独特性,失去了独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文学生命的死亡。余秀华拒绝被评论者们归类,拒绝与范雨素为伍,本质上其实就是为了维护对她而言生死攸关的独特性。著名诗人及诗歌评论家王家新对余秀华的出言不逊颇为愤怒,5月12日,凤凰网转发了他在《新周刊》上发表的题为《如果失去了同情心,我们的文学还能用什么打动人》一文。王家新此文旨在为范雨素打抱不平:“关于范雨素,余对记者讲了四点:‘一,文本不够好,离文学性差的远。二,每个生命自有来处和去处,不能比较。三,每个坚强的女人都很辛苦,不值得羡慕。四,我都不愿意和迪金森比较,何况是她。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文学性当然重要,谁也不会否定,但她忘了,范雨素并不是什么作家,如她自己声称她只靠苦力吃饭,不靠写文章谋生;那些受到感动的人也并没有把她的文章奉为文学经典。‘文学性’不应是一把板斧,用来砍向她这样的打工写作者。……‘文学性’也是有着它的底线或‘道德的最低限度’(阿多诺)的,这个‘最低限度’即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理解、同情和尊重——尤其是对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灵。”但王家新将范雨素贴上打工写作者的标签,充满悲悯地称范雨素们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灵”,不更是对渴望通过写作获得生命尊严与精神超越的范雨素们的冒犯和轻慢吗?

同样对媒体和评论者们贴标签的行为感到不快的范雨素,却表现出了一个以体力劳动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底层劳动者的豁达。和余秀华不同,范

雨素是一个生活阅历丰富的女人,对命运的坎坷和他人的不易,有更多体谅、接纳与理解。在谈及自己的性格时,她自称是一个随和的人,不跟人较劲儿。面对各类媒体的穷追不舍,范雨素尽管心里又惶恐又不乐意,可是出于对记者们辛劳工作的体谅,她还是勉为其难地尽量加以配合,其宽厚温暖的个性由此可见一斑。当人们让她评价余秀华时,范雨素更多表达的是对余秀华的同情之理解。4月27日《中国新闻网》发表《范雨素:不靠写文章谋生,原本只想挣点稿费》一文,提及余秀华和范雨素的相互评价:“26日,范雨素的文学创作水平也引发自媒体圈的热议,而农民诗人余秀华也疑似发布朋友圈,称不属于跟对方相提并论。此前,范雨素也曾公开评论过余秀华的创作水准。其在接受采访时称,‘(余秀华)出名的那首诗叫《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那些媒体关注的点是残疾、情色,然后才是她的才华。’”说这话时,范雨素或许也想到了自己: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写作者范雨素的底层身份,然后才是她的写作,最后才是她想要通过写作确认的生命尊严。

对于媒体与学界将其写作贴上底层写作的标签,作为当事人的范雨素们,心情极其复杂。一方面,在他们日常的写作练习中,包括与张慧瑜这些学者的交往中,他们认同于自己的底层身份,对甘愿服务于底层写作者的文化人深怀感激;另一方面,范雨素们也坦承,他们并不喜欢专家学者们包括媒体人将其写作贴上底层标签所暗含的居高临下姿态。范雨素们写作的初衷,就是要以写作的方式来争得精神平等,为赢得生命的尊严而抗争。将其写作贴上底层写作的标签,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无情否认了范雨素们以写作的方式来超越底层身份、追求精神平等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 苏宁)